

呐喊之士 与待鹤山人

◆ 王业群



郑观应塑像

那天，如果不是朋友事先通过中山市电话查号台一路打听联系，直到帮我们找到了郑观应后世亲属家的电话，我们探访郑观应故居的愿望恐怕要落空。因为郑的故居目前尚未开放，里头还住着他的侄曾孙一家人，而附近（包括故居门口）什么路标、门匾、提示都没有。这个叫三乡镇雍陌村的地方，虽然紧挨从中山通往珠海的路旁，但问人郑观应故居在何处，多摇头不知。还是靠离故居咫尺之近的一位老伯指点，我们才找到了藏着故居的那条窄巷，名西上二巷。但不知巷中哪一间才是。亏得主人这时已

出门迎候，否则我们真的会不得其门而入。

郑观应故居的门牌是6号，却在巷头；再前面，已拆出了一小块空地。故居外观和内部结构保存还算好，其侄曾孙上世纪60年代住进后，已将屋内做了改动，但原建筑格局的轮廓还很清楚。屋主告诉我们，到此处来访的人不多，他甚至可以记得每一次的具体情形。政府的确有把这里修整开放的打算，也筹划了很长时间，补偿费都谈好了，但迁居地点尚未交涉妥，所以他没有应允搬走。听他言谈中不断提到《盛世危言》，我便问他读过此

书没有，他说读了，而且似乎很知道一些书中内容和毛泽东与此书的关系。特别有趣的是，他说过去知道郑观应的人之所以不多，“可能是由于阶级问题”，因为郑“提倡的是资本主义”。又说，其实中国现在所做的，就是郑观应当年所说的，如果早这样做，中国也早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。他这一番话说得我不知如何作答。面对这个看上去诚实憨厚，目光中却透出那种典型的农民智慧的壮年男人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说什么都多余。因为这就是中国，这就是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的真实情况——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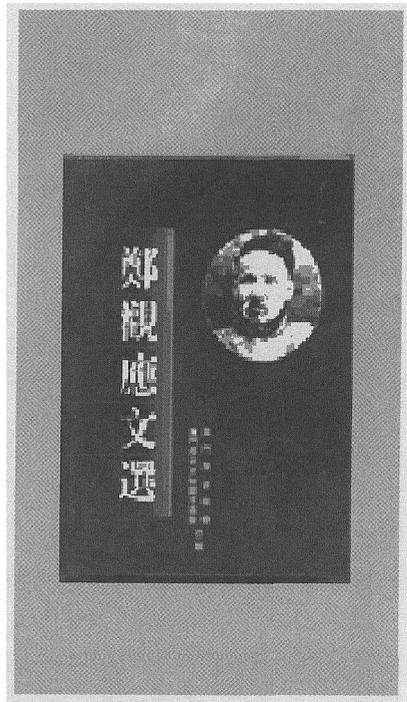
求实际、化繁而简、天生着几分利益盘算者的精明。很多人对所谓的城市化兴奋不已，以为我们能轻而易举地跳过城市发展历史，达到西方国家的那种城市化，这真是幼稚病。不错，我们可以很快就化掉乡村公路，化掉草屋茅寮，甚至化掉人表面的一切，但骨子里的东西呢，那么容易化掉吗？

郑观应当然属于例外，他是同时代人群中的佼佼者，独具慧眼、出类拔萃。从学养和理论功底来说，他自然比不上康有为、梁启超；从社会活动和政治影响力来说，又无法和孙中山相比。但他的思想对这三个人的启发和影响本身，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对比康、梁，郑观应少了理论的大气磅礴及学究气，却紧贴现实，显得精明干练、老成持重和有丰富的实际经验。其思想理论的特点是直指现实、开方下药，且囊括范围之广、格物致知之细、可操作性之强，为康、梁所不具。他虽与康、梁同属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，但对康、梁的维新活动却颇不以为然，认为“康、梁办事毫无条理，不知度德量力，将来必有风波。”（见夏东元《郑观应集》）他和孙中山虽都推崇西方议会制，还积极向盛宣怀推荐孙，请盛将孙转荐给李鸿章，但他的议会制只止步于君主共和，与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活动走的不是一条路。从《盛世危言》中，我们可以清楚感到郑观应由于具备几个特殊条件：传统文化熏陶、实业家的出身和经历、出洋考察并懂英语，所以见多识广、知识渊博、看问题透彻，有独到见解，且十分懂得如何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游刃。这

些特点在同时代人中是不多见的。比如，他极力反对中国选官制度和强调异地任用的办法，认为它造成了官员普遍“所学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长”，是最为西方人所轻侮的弊端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反对不讲专业和个人特长的随意性轮岗，使毫无特长和建树的人总能得到“常调官好做”的实惠。他提出以薪养廉，费用不足则裁减冗员，这是直到现在还讨论不清的问题。在对外国传教活动的处理上，他的见解也超出一般人，能清醒地认识到中、西文化实际上互相都有影响力，中华文化可以同化外域人。他关于通商“实关富强大局”和弱国无外交，“利归强、害归弱”的论述，显示了他与很多迂腐人士的不同之处。而他对中国官场“京官”畏葸、“外官”敷衍，官员们互相推诿、动辄请旨、空言塞责现象的一连串批判，更可谓洞若观火、一针见血！《盛世危言》中除大量涉及晚清国家政体、刑狱、商务、财税、教育、实业等问题的文章外，还有不少涉及国防军事领域，许多分析提议既有战略家的眼光，又有工匠打造的精细，实在难能可贵。此书能在当时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，并受到朝廷认可，乃是动荡危急的社会局势使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僧道》一篇中，郑观应提出了自己对佛、道二教的认识和处理办法。文中他把老子学说与道教完全混在一起谈，我认为是盲从世俗观点，实际上这两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。他把为数众多的教徒看作社会不良因素的根源，谈教色变，这也未免欠妥当。但他提出对待和处理佛、道二教的办法却

很有意思。按他的想法，朝廷对二教的态度是，可以允许生存，但不能允许建宫、观、寺、院，不得召徒聚众，使二教教徒真正做到独身隐遁，这正是所谓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即以佛、道宗旨制佛、道本身的办法，可算是“奇招”了。而郑观应自己则是富于宗教思想的，其号“罗浮待鹤山人”就有很强的仙道意味。晚年他对修道更是迷恋，并且入室修道，发表了用仙道统一天下的幻想，终于回归到了传统思想的老路。这个为国家富强擂鼓呐喊、锐意进取、敢想敢说敢做之人，同时是一介清高之士，不意为官，不愿攀附官场权贵，有数次可能会对其政治前途发生重要影响的场合与机会，他都有意退避，明确表示“藏拙不赴”，愿遂“草茅初志”，81岁（1842——1922）时在上海终乘鹤仙去，次年移葬于澳门前山。



本栏文字编辑：李亦彤